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演变与发展*

唐丽霞　李小云

[内容提要]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在过去60多年里发生了显著变化,援助主体从最初美国独大到如今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受援助国从战后欧洲国家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国际发展治理结构从"发达—不发达"二元对立到南南合作,一些传统的受援助大国成为新兴援助体,国际发展援助目标从经济增长转向社会发展,国际发展话语权由西方主导逐渐变成南北共同商议等。本文从援助主体、援助客体、援助目标和领域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深入讨论了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这些变化过程以及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国际发展援助　多元主体　受援客体　有条件援助　合作

现代国际发展援助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4年,为了摆脱大萧条给世界经济带来的破坏,在美国的主导下,来自44个国家的730名代表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镇召开了联合国金融和财政大会(又称布雷顿森林大会),大会决定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并且明确了世界银行作为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贷款机构的职能,国际发展援助的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基本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正式拉开了国际发展援助的序幕,此后,国际发展援助成为和投资、贸易并驾齐驱的国际合作方式之一。在过去60多年的时间里,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早期美国的一枝独秀到现在多中心的全球化格局日益明显,发展援助的主体、客体、目标和领域都在不断地变化和调整,对全球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国际发展援助的援助主体:从美国独大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国际发展援助虽然最早起源于英国等国家在殖民地实行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援助,但目前国际社会都将1947年美国为

* 本文得到了2013年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的支持。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援助欧洲大陆重建和发展实施的马歇尔计划作为国际发展援助正式开始的标志。从1948年到1951年底,美国向欧洲提供了131.5亿美元的援助,其中88%是无偿赠款,在援助最多的年份,美国将其国民收入的2%—3%援助欧洲,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后来联合国提出的0.7%的标准。为了和美国争夺势力范围,以及体现各自阵营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当时的苏联也开始了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大力援助,并希望通过对新独立国家的援助,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势力范围,到1960年,苏联和包括中国在内的18个国家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每年对外援助额度为4.5亿美元。[①]与此同时,美国开始把援助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前线国家,如希腊、土耳其、南越和南韩,对外援助成为美苏两大阵营相互抗衡的重要工具。[②]

进入1960年代,在美国马歇尔计划支持下迅速发展的欧洲国家开始提供对外发展援助,从1960年到1980年,先后有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英国等17个欧洲国家成为援助国,在马歇尔计划时期行使有效管理职能和利用马歇尔援助计划援助资金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完成了历史使命,在美国的倡议下,政府间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取代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1960年,经合组织成立了发展援助委员会(DAC),目前该组织已经拥有包括欧盟在内的29个成员国(机构),构成了国际发展援助的主体。发展援助委员会界定发展援助的参量,规定援助转移的质量标准,确立报告和监督发展援助的指导方针,整理归并成员国的相关数据,是发达国家对外援助的主要信息统计和政策协调机构。[③]至此,国际发展援助已逐步演变成西方发达国家共同主导的体系,发展援助委员会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构建国际发展援助话语体系的重要平台。

从1970年开始,以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石油输出国开始提供对外援助。1980年,中东地区石油输出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达到94.7亿美元。在1975—1986年间,其所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达到231亿美元,[④]但主要对象都是周边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影响程度十分有限。[⑤]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提供一些小额的国际援助,以巩固其在区域的大国地位,如南非、印度、尼日利亚和巴西。[⑥]但是,由于这些国家援助规模甚小,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的影响甚微。

长期以来,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国际双边发展援助和多边援助的主要资金供给国,长期主导着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和框架,而发展中国家则长期处于接受援助的被动地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期。并且随着一些新兴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提供发展援助的规模不断增加,尤其是金砖五国。中国的对外援助规模从2000年的5.54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9.47亿美元,增长了近4倍;俄罗斯从2004年的1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7.85亿美元,巴西从2005年的1.58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3.62亿美元。2009年,这五个国家的发展援助总额为36.91亿美元。[⑦]虽然和发达国家的援助规模相比,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援助仍然非常少,但是,从国际发展援助主体的变迁中可以看到,一方面,长期主导国际发展事务的西方国家由于经济实力的下降以及西方发展方式在发展中国家遭遇的挑战,使其对国际发展事务的控制力开始减弱;另一方面,新兴国家的崛起和不同发展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方式的成功实践,特别是中国持续经济增长和大规模减贫所创造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奇迹”,以及金砖国家的兴起,尤其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构想的提出和实施,将会深刻地改变国际发展合作的格局。

援助主体的增加直接导致了不同主体之间角力场的变化,1950年代是美苏的阵营之争,美国极力向欧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大规模国际发展援助,是为了限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大,确保原材料的获得,并保持在全球投资和贸易领域的领头地位。[8]1960年代以来是地缘政治之争,地缘政治因素对援助资金流向的影响力日益凸现。美国将援助重点转到了拉丁美洲,与拉丁美洲国家一道建立了“进步同盟”,在拉丁美洲推广“土地改革”,通过经济援助和促进社会改革抵消国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影响;[9]石油输出国,尤其是科威特,将援助的重点放在了中东地区和穆斯林国家;战后快速发展起来的欧洲援助国则秉承对原殖民地援助的传统,继续为其提供大量援助;印度则将绝大部分援助放到了南亚周边国家。

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集团)和联合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相继成立,并成为后来主导国际发展援助的主导力量。1951年,联合国聘请一批发展经济学家撰写了题为《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措施》的报告,该报告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计划、政府的作用、投资规模以及受援助情况等方面都做了系统的论述,直接指导了世界银行以及其他联合国机构在后来逐渐形成的发展议程。1960年代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力量不断加强,联合国的成员不断增多,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尤其大量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并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使得联合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各自权益的一个重要平台。196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一个发展的十年战略,1970年又通过了第二个发展的十年战略,要求各发达国家使其对外援助额度增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0.7%以上。1960年,世界银行成立了以提供优惠和灵活贷款、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国际开发协会(IDA),并加强了国际金融公司(IFC)的职能,通过向受援国私人生产型企业提供无须政府担保的贷款或投资,鼓励国际私人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生产提供优惠贷款。1965年,联合国成立了开发计划署(UNDP),专门从事发展援助事宜。这一时期,泛美开发银行(IDB)、非洲开发银行(ADB)和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地区性开发银行相继成立,成为所在区域内发展资金的重要提供者。以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多边发展援助机构的援助规模,相对于1960年代之前均有数十倍的增加,尽管总量依然大大低于双边国际发展援助,但到1970年中期,国际多边发展援助机构提供的援助金额已经占到国际发展援助总额的30%以上,在发展援助中的作用日益增强。[10]虽然从资金总量上来看,国际多边机构的援助规模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但在国际发展议程的创新和引导方面作用明显,基本需求战略、以良政为基础的结构调整计划、以减贫战略为核心的重债穷国计划以及当前国际社会正在合力为之努力的千年发展目标等国际发展援助行动纲领的提出和实施都离不开国际多边发展机构的贡献。

除了官方援助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外,非政府机构和私人部门在发展援助体系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国际非政府机构在发展援助中发挥作用最早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为战争难民提供救济服务的乐施会(Oxfam)和关怀国际(Care International),截止到2009年,全球共有25000家国际非政府机构,其中有4000家在国际发展领域开展活动,OECD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国际非政府机构提供的发展援助资金总量达到了220亿美元,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曾用"先驱者"来高度评价国际非政府机构在发展援助领域的作用,认为"它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使数十亿贫困人口脱离贫困"。[11]此外,私人部门在国际发展领域的作用也越来越活跃,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比尔·盖茨基金会,尤其是比尔·盖茨基金会在非洲大陆发起的"绿色农业联盟"活动对于非洲农业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

官方发展援助主体的不断扩充以及非官方发展援助的蓬勃兴起促进了国际发展援助主体的多元化和多层次性,发展援助成为全球国际合作的重要工具,也成为全球不同发展主体相互竞争的重要领域,各种发展对话和论坛活动日益兴起,为不同援助主体的参与提供了平台,为它们进入国际发展援助主体话语体系提供了机会。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和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多边发展援助机构在国际发展援助话语体系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二、国际发展援助的受援客体:欠发达国家和有条件援助

虽然现代国际发展援助起源于美国对欧洲国家的战后恢复和重建,但国际发展援助的对象很快就转向了发展中国家。杜鲁门在"第四点计划"中第一次用"欠发达国家"来标记经济落后国家,[12]将美国的对外援助对象从欧洲扩展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不发达地区。到1951年底,有33个欠发达国家受益于"第四点计划"。同时,持续4年的以战后欧洲国家为援助对象的马歇尔计划结束,标志着国际发展援助体系正式将欠发达国家作为援助对象,此后,在联合国的两个"发展的十年"中,非常明确地提出国际发展援助的对象是欠发达国家。这一时期,虽然"欠发达国家"的概念已经开始被广泛使用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但含义和边界都比较模糊,并没有严格的界定。随着国际发展援助知识体系的发展,欠发达国家的定义越来越清晰,尤其是不同领域的国际多边机构相继提出不同的界定方法和各种欠发达国家名单,从而可以根据各个国家所处的不同发展状况,提供不同层次的发展援助。

世界银行根据人均GDP将全球经济体分成低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上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只有低收入国家才能获得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开发协会(IDA)的无息贷款(软贷款),而中高收入国家只能获得世界银行体系的混合贷款和硬贷款。世界银行每年的7月1日会根据上一年的人均GDP来对全球各经济体进行分类,从而确定各经济体的贷款资格。联合国系统则根据人均国民收入、人类发展指数和经济脆弱程度等综合指标确定最不发达国家(Less Developed Country,LDC)名单,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下属的发展政策委员会每三年审定一次最不发达国家的名单,目前全球共有49个最不发达国家,它们可以获得联合国系统的各项支持。例如,联合国系统的贸易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援助和WTO的贸易援助通常只有最不发达国家方能获取,而最不发达国家也会优先获得全球其他发展援助机构的援助。199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债务负担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在低收入国家中进一步识别重债穷国,从而启动了重债穷国计划,为其提供债务减免援助。此外,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也都根据各国农业发展情况和粮食安全确定了各自的援助国名单。这些多边援助机构对全球欠发达国家的划分也直接影响到了双边发展援助的资金流向,全球发展援助重点流向这些国家,虽然这种流向从总体上符合发展援助最初的本意,但是无论何种识别方法都将人均GDP作为一个前提指标,人均GDP指标的总体性特点掩盖了一个国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有研究发现,全球3/4的世界贫困人口(大约10亿人)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人口密集的中等收入国家,如中国和印度,[13]而这些国家很多都不再是国际发展援助的重点。

即便是在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多边机构识别的低收入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中的发展中国家也不能自动获得发展援助的支持,从1980年代初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计划开始,援助条件已经成为国际发展援助的核心,很多援助机构出于不同目标开始实施有条件的援助,[14]一个国家的财政政策、贸易自由化、公共企业私有化和农业私有化等等成为世界银行提供政策性贷款援助条件考量的重点。[15]近年来,世界银行对受援国的援助条件开始有所变化,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公共部门的管理能力、公共财政管理、公共开支和公共部门改革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援助条件。[16]此外,受援国的政治条件直接影响到援助机构对其提供援助,受援国如果发生"种族清洗"、军事政变或终止民主化进程、人权问题等情况,援助机构就会采取停止全部援助项目、停止续签新的援助项目、停止部分援助项目、全面减少援助配给四个不同级别的援助制裁。[17]国际援助体系除了对受援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条件有这些具体的约束外,一些援助方案的实施还需要受援国制定特定的行动战略,并且该行动战略要得到援助机构的审查和评估,通过之后方能获得援助资金的支持。以重债穷国减债计划和多边减债动议为例,这两项最主要的减债计划要求受援国制定减贫战略文件(PRSP),由世界银行体系对该战略进行两阶段的审查,如果达到决策点,方可启动重债穷国计划,达到完成点,可启动多边减债动议。截止2010年6月,总计有67个国家发布了自己的减贫战略文件,但只有36个国家达到了决策点,32个国家达到了完成点。由于各种附加条件的提出,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援助的成本越来越高。这种有条件援助也受到了正在蓬勃兴起的以不附加条件和不干涉内政为主要特点的南南合作的挑战。

三、国际发展援助的目标和领域:从经济增长到社会发展

马歇尔计划在欧洲的巨大成功使得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将援助的基本目标定位于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其暗含的理论假设是:受援国只要实现了经济增长,其他发展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一时期,国际援助主要流向制约受援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部门,如支持受援国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进口替代战略和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实施,等等。但是,经过近20年的努力,对于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国际援助并没有重现马歇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尔计划的辉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形势更加严峻:经济增长没有实现,失业问题严重,社会贫富分化严重,长期忽视农业部门导致农业发展陷入危机,许多非洲国家还在1970年出现了粮食危机。此外,1969年,世界银行对之前的国际发展援助进行了系统评估,提出了《皮尔森报告》,在肯定了之前国际发展援助的努力的同时,也客观地提出了存在的许多问题,尤其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扩大,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成效甚微,同时,石油危机和对越战争的失败也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对美国发展模式的疑问。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倡导"全球相互依赖"的思潮,拉丁美洲学者进而提出了"基本需求战略"。

"基本需求战略"的提出受到美国的追捧,该战略一方面满足了西方国内民权主义者的主张,可以争取公众支持增加对外援助预算,另一方面又能在道德层面掩饰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国际发展援助维护其政治战略和经济利益的意图。1973年,美国对外援助开始采用基本需求框架,并逐步引入人类发展和人权等思想。1976年,国际劳工组织正式提出"基本需求战略"方案,从而影响了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发展机构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项目。此外,随着越来越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在国际发展框架中的话语权开始加强,越来越多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尤其是在发展理念上开始发挥引导者的作用,先后提出环境与发展(1972年)、饥饿与粮食问题(1974年)、人口增长(1974年)、妇女发展(1975年)、就业和基本需求(1976年)、移民问题(1976年)以及科技与发展(1979年)等援助应该关注的领域和目标。[18]

1970年代,国际发展援助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努力并没有扭转之前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援助所引发的受援国债务危机。进入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环境更为恶劣,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引发了大量受援国的债务问题,国际发展援助开始从关注贫困问题转向解决债务危机。同期,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拥泵,倡导"华盛顿共识",要求受援国进行经济私有化改革以及政治上的民主化和"良治",并以此为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尤其是世界银行开始实施结构调整计划。这一时期,国际发展援助一方面将重点重新转向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发展领域继续进行多种尝试,推行了可持续发展和自下而上的参与式发展等后来一直主导国际发展援助的理念。

1990年代,由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以私有化和良政为条件的援助,不仅没有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债务负担的缓解,反而导致了援助疲劳和援助依赖,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更加严重,世界银行不得不在2004年宣布结构调整计划失败。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冷战结束后政治议题的降温,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环境、贫困等发展问题已经突破了单个国家或地区的范畴,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联合国系统再次倡导将援助的目标回归到发展问题上。1990年代,联合国组织召开了一系列的发展大会:1992年召开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1994年召开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强调了人人平等的发展权;1995年召开了世界妇女大会,关注促进性别平等;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996年组织召开了世界粮食峰会,关注全球粮食安全问题;1997年召开全球气候大会,再次关注全球环境问题。通过这些高端峰会,参加会议的国际多边机构和国家共同讨论应对全球共同发展问题的协商机制和行动计划,并为国际发展援助各方在这些领域的联合行动提供了行动框架。

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在OECD—DAC框架下也开始讨论国际发展援助的目标和领域。1994年,发展援助委员会发布了"新全球形势下的发展伙伴"方案,该方案同意将减贫作为国际发展合作的主要目标,同时将经济政策、社会保障、参与和性别平等、良政、人权、法制建设、可持续的环境政策和防止冲突作为主要的政策措施。[19]1995年,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发展部长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领导人采纳了这一方案,并提出考虑下一个世纪的发展问题。1996年,发展援助委员会出台了《重塑21世纪》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目标,成为后来千年发展目标的基础。1997年,联合国秘书长、世界银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和经合组织秘书长共同发布了一份题为《所有人的美好世界》的文件,该文件构成了后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基本框架。2000年,联合国组织召开了千年首脑会议,提出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为国际发展援助中长期工作的行动指南和目标,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接受了千年发展目标,标志着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了真正密切的联系。2002年蒙特雷共识的形成则标志着西方发达国家从实践层面认同了千年发展目标,将其作为发展援助筹资和投入的重要目标。至此,全球在国际发展目标和发展关系构建上达成了共识,发展援助越来越"去政治化",越来越趋同于全球公共价值体系,如减贫,环境和气候变化等。

四、后2015发展框架的讨论:从各自为阵到合作共谋

在国际环境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国际发展援助呈现出合作理念和实践方式日益多元化的演变和发展趋势。从援助主体上来看,国际发展援助从早期的美国一枝独秀到欧洲国家后起直追,再到多边机构引领以及如今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以西方为主的发展意识形态和实践框架受到了挑战。国际发展合作治理结构中单向的"发达—不发达之间的援助—受援"二元关系演变成了"发达—新兴—不发达国家之间合作"的多元关系。在新的国际发展援助格局中,西方的权重在下降,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权重在上升。相对于援助主体的变化,受援国体系也在发生变化,早期接受美国马歇尔计划援助的欧洲国家早已成为援助的主要提供者,巴西、韩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以及印度、中国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作为发展援助曾经的重要流入国也开始成为新兴援助体,全球的发展援助越来越多地流向非洲和亚洲的最不发达国家。国际发展援助的目标从促进经济增长转向促进社会发展,国际援助的优先领域和重点领域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和调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援助主体不断增加,受援国名单不断调整,援助目标和领域不断变化,但国际发展援助的整体性特点却更加明显,即从各自为阵走向合作共谋。西方发达国家借助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平台努力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达成一致和共识,一直都存在理念分歧的联合国系统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因为千年发展目标达成一致,长期被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忽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视的南南合作近几年也因为金砖五国的兴起而日益得到重视,这一发展趋势充分反映在全球后2015发展框架的讨论中。

2015年之前,国际社会一方面仍然致力于筹集发展资金,推动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另一方面也在不遗余力地构建新的发展框架来替代千年发展目标。2010年9月,在联合国千年目标峰会上,很多国家倡议启动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讨论。联合国发展小组支持启动了11个专题磋商并在50个国家展开讨论。随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专门成立了联合国系统工作组,以协调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准备工作。2012年6月,联合国成立开放工作小组,核心任务包括评估联合国系统内部关于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各项努力,向各利益相关者征求建议,为2015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的磋商提供一个高瞻远瞩的愿景。该工作组于2012年6月提交了阶段性报告《实现我们共同憧憬的未来》。[20]2012年7月,联合国成立名人小组,开始准备2015年后发展议程框架的相关报告,该小组27人中有12人来自发展中国家,3位小组主席中有两位来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反映。磋商范围包括了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国际发展机构、商界、学界、非政府组织及各种民间力量,并设立了"我想要的世界和我的世界"全球在线反馈机制。名人小组于2013年5月发布了《新型全球合作关系:通过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并推动经济转型》的报告。此外,联合国还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研究网络,开展了"一百万个声音"等活动,以便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讨论2015年后发展框架。除了联合国的行动外,欧盟委员会、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等官方援助机构以及来自韩国、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发展合作研究智库都纷纷开展了2015年后发展框架的讨论和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技术性报告。作为全球发展合作领域新兴力量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没有形成单独有效的行动机制,但在联合国主导的各项活动中都能听到它们的声音。2013年3月,南非德班金砖国家峰会通过的《德班宣言》也重申将共同致力于加快在2015年目标期限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强调2015年后的发展议程应基于千年发展目标框架,继续关注消除贫困和人的发展,同时在考虑发展中国家各自国情的条件下应对其他新挑战。[21]从整个2015年后发展框架的讨论和行动中不难看出,国际社会为制定新的国际发展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合作共谋局面,这也正是当前国际发展合作格局出现的新的趋势和特点。

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同援助主体之间的合作正越来越多地体现为日益兴起的三方合作。在发达国家中,日本一直都非常重视三方发展合作,先后和12个国家签署了合作伙伴计划,共同在第三国开展发展援助活动,包括新加坡、泰国、巴西、埃及、突尼斯、智利、巴西、阿根廷、菲律宾、摩洛哥、墨西哥、印尼和约旦等。新兴援助国在对外援助中也更多地强调三边合作,像阿根廷、巴西、智利、埃及、印度、马来西亚、韩国、南非、新加坡、泰国、突尼斯和土耳其等国都分别和其他发展援助国以及多边机构进行合作,共同在第三国开展援助行动,巴西已经与日本、德国、美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爱尔兰和澳大利亚等7个发达国家建立了合作机制和伙伴关系,共同在发展中国家开展联合行动。印度、巴西和南非三个新兴国家之间促进南南合作与交流的三边合作机制(IBSA),旨在建立新的国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际结构,在国际事务等诸多领域加强三国的紧密关系。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在对外援助中的影响力也吸引了很多传统的援助机构提出和中国共同开展发展援助行动的需求,目前中国与世界银行、英国等援助主体正在积极筹划合作事宜,而上述新兴援助国的三边合作机制值得学习和借鉴,三方合作机制也将成为未来国际发展援助格局继续向前发展的一个新的特点。■

注 释

①④⑩ 李小云、唐丽霞、武晋:《国际发展援助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4、31、30页。

②③ 丁韶彬:《国际援助制度与发展治理》,载《国际观察》2008年第2期。

⑤ 毛小菁:《国际援助格局演变趋势与中国对外援助的定位》,载《国际经济合作》2010年第9期。

⑥ Carol Lancaster, *Foreign Aid: Diplomacy, Development, Domestic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 33.

⑦ Felix Zimmermann, "More Actors, More Money and More Ideas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23, 2011.

⑧ George Mavrotas, *Foreign Aid for Development: Issues, Challenges, and the New Agend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9.

⑨ 周弘:《美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发展》, http://bic.cass.cn/info/Arcitle_Show_Study_Show.asp? ID = 2635, 2002。

⑪ Thomas Richard Dav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NGOs and Their Impact on Development Aid", in *Aid, Emerging Economies and Global Policies*, The Graduate Institute GENVEA, 2011, pp. 48 - 49.

⑫ Gilbert Rist,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from Western Origins to Global Faith*, Zeb Books, 2008, p. 73.

⑬ Sabina Alkire, "Where Do the World's Multidimensionally Poor People Live?", *OPHI Working Paper*, No. 61, 2013, http://www.ophi.org.uk/wp-content/uploads/ophi-wp-61.pdf? 0a8fd7.

⑭⑯ World Bank, "Review of World Bank Conditionality", *Working Paper*, 2005,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PROJECTS/Resources/40940 - 1114615847489/ConditionalityFinalDCpaperDC9 - 9 - 05.pdf.

⑮ Oliver Morrissey, "Conditionality and Aid Effectiveness Re - evaluated", *The World Economy*, Vol. 27, 2004, pp. 153 - 171.

⑰ 田德文:《从英国援助政策看主要援助国官方援助的政治条件性》, http://www.edu.cn/she_hui_shi_jian_1066/20060323/t20060323_75772.shtml。

⑱ Richard Jolly. "The UN and Development Thinking and Practice", *Forum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No. 1, 2005, pp. 49 - 73.

⑲ Jim Michel, "The Birth of the MDGs", http://www.oecd.org/dac/thebirthofthemdgsdacnewssept - oct2005.htm.

⑳ 许佳君:《后千年发展议程国际动态》,载《国际减贫动态》2013年第12期。

㉑ 张春:《构建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中非合作对国际发展合作的贡献》,载《国际展望》2013年第3期。

[唐丽霞、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 宋阳旨)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